

陈求鲁奏折里的历史

阮柏林

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41岁的陈求鲁以第二名的成绩及第，成为乐清历史上有数几位高名次进士之一。此后，他在仕途上从地方政府的尉、丞到皇帝身边的近臣侍讲、侍读，一路勤勤恳恳的当了30年官，以廉洁清明、刚正不阿的高风亮节，赢得了朝野的赞誉和后人的敬仰。

史载陈求鲁英敏端重，博涉群书，尤精于《易》，但是，他留给后人的财富，却是不大被人注意的经济学上的贡献。《宋史·食货志》载录了他奏折中的二则相关内容，一则说赋税，一则说会子，至今仍被学界所关注。



赋税

《宋史·食货志上·方田赋税》卷载：淳佑八年（1248），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仁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历之弊法也。常赋之入尚为病，况预借乎？预借一岁未已也，至于再，至于三；预借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借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罄其永业，岂足支数年之借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簸弄，上下为奸，公私俱困。臣愚谓：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俾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俾县令得以究心于抚字；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以重其权；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以激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版籍，约其妄费，裁其横敛，则预借可革，民瘼有瘳矣。

表面上看，这是一则议论赋税的奏折，但只要稍作注意就会发现，这则奏折的重心则是另有所指。

宋朝的赋税实行唐大历两税法。所谓大历两税法，其实是在唐德宗即位的大历十四年（779）五月由宰相杨炎提出，第二年即德宗建中元年（780）下诏开始实行的新税制。它的基本内容是：由中央政府确定总的税额，然后按各地具体情况分配征收数额；纳税对象不分主、客户（原居民和外来户），以当时的居住地为准，外来户只要在居住地有资产（房屋、土地），都编入居住地户籍，在当地缴纳赋税；规定纳税对象每户按资产交纳户税，按地亩交纳地税，一年内分夏季和秋季两次完成。同时废除之前的租、庸、调法的赋税内容和其他一切杂税杂役。两税法的实施，消除了原本极端混乱的税制，扩大了税收源头，也有

效的防范富人、权贵阶层偷逃税的途径，保证了国家财税的来源。

客观的说，大历两税法的制订，是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大进步，至于陈求鲁说两税法是大历弊政，其根源不在于大历两税法，而在于两税法之外的杂税和预借等弊端。就象唐德宗推行两税法后不久又增加了许多额外的税收一样，宋朝虽然也行两税法，但有些税，如丁口税、屋税等项，却又另外起税，并不包括在两税当中，此外，又有许许多多推派、杂捐、科索等额外的征收。陈求鲁在奏折中特别提到的使百姓不堪重负的预借，也自有其历史渊源。《宋史·食货志·方田赋税》卷载：

（绍兴）六年（1136）八月，预借江、浙来年夏税绢帛之半，尽令折米。两浙绢帛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石。

正所谓上下效，宋高宗赵构自己开启了赋税预借之门，地方官吏因此以各种名义大行预借之事，终南宋一朝这扇大门再也没有被关闭过，当然，有些地方官的预借是逼不得已的。陈求鲁曾任地方官多年，深悉其中的苦衷，因而，他为救治这种种弊端所开出的药方 今日救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 的四个办法 宜采夏侯太初并省州郡之议 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 法艺祖出朝绅为令之典 遵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意 内容，则全在于提高县令的地位和权力方面，这其中又另有深意。

古代县令，既是一县之长官，掌管国家赋予的地方政、民、财等大权，但同时，又要负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的上司和过往军政要员们接待等事务，以及其他一些貌似冠冕堂皇的推派和征收，这些人员中的无论哪一个，都是县令得罪不起的人物，无论哪一件推派，也都是

县令所怠慢不得的事，《宋史·食货志·方田赋税》卷所载一事，就是南宋时县令处境的最好写照：

（绍兴）二十六年，先是，承议郎鲁冲上书论郡邑之弊：以臣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漕计合收粟名，有丁盐、坊场课利钱，租地钱，租丝租纰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缗。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供钱、余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申节银绢钱之类，岁支不啻三万四千余缗。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券、与非泛州郡督索拖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意，而拙于催科，旋踵以不职罢；能迎合上司，惨刻聚敛，则以称职闻。是使为令者惴惴惟财赋是念，朝不谋夕，亦何暇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承流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议：今铨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缘财赋逼迫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罢献羡余，蠲民积欠，谨择守臣，戒飭监司，则吏称民安矣。乃诏行之。

绍兴二十六年（1156）去淳祐八年（1248）已近百年，但是，从陈求鲁的这则奏折内容可以看出，理宗时期的县令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否则，陈求鲁不可能将赋税之事与提高县令地位、权力之事扯到一起。陈求鲁入仕之初即在县里当县尉，以后又在福建闽县当了二年县令，很熟悉当时县令的工作环境和压力。在陈求鲁的眼里，当时有些县出现预借数年赋税的事，正是由于县令地位低下，权力小，无力抗拒来自各方的不正当要求而致。因而，他所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四个方法，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个办法，朝廷应当以提高县令的地位和权力的办法来抑制各种不正当的杂税杂征。

会子

嘉定二年（1209年）第十四界：发行量11263万缗；

嘉定四年（1211年）第十五界：发行量23000万缗。

从以上数字不难看出，宁宗一朝会子的膨胀速度是以几何级数上升的。到了理宗嘉熙四年（1240）时，社会上流通的十六、十七两界会子数额已达达5亿。为了控制会子发行量，政府又发行了以一贯准十七界五贯的十八界会子。因为十七届会子基数的原因，十八届会子的发行量仍然达到5000万的巨额，远远超出了乾道四年设定的界以一千万缗为额 的数字。在由会子流通膨胀造成的市值持续长期疲软的情况下，许多商人以低价收购会子，从而促使铜钱的价值持续走高，会子价值更是越发不可收拾。史载会子初发行时，一缗值铜钱770文，淳熙十六年（1189）临安府会子一缗值700余文，从此之后一路狂跌：宁宗庆元元年（1195），一缗值620文，嘉定三年（1210）一缗值400余文，端平三年（1236）一缗值300文，到宝佑年间（1253 - 1258），十八界会子每缗只能兑铜钱192文。

理宗淳佑七年（1247），政府对会子的恶性膨胀已经失去了以新换旧的控制能力，只能规定十七、十八两界会子不立限，永远行使。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时任监察御史的陈求鲁上书说出了自己的忧虑和见解。《宋史·食货下二·钱币》载：

（淳祐）八年，监察御史陈求鲁言：议者谓诸便于运转，故钱废于窖藏；自称提之屡更，圜法为无用。急于扶楮者，至噉盗贼以窥人之阖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然不思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京城之销金，衢、信之鎗器，醴、泉之乐具，皆出于钱。临川、隆兴、桂林之铜工，尤多于诸郡。姑以长沙一郡言之，乌山铜炉之所六十有四，麻潭鹅羊山铜户数百余家，钱之不坏于器物者无几。今京邑鎗铜器用之类，鬻卖公行于都市。畿

北宋时，四川成都16位商人集资36万贯铜钱作为基金，发行了纸质票券 交子，是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雏型。因为纸币便于携带、转运，客商两便，深受流通领域的欢迎，全国各地乃至地方政府很快就群起仿效，先后出现了类似的 会子、关子、公据 以及由以上名称衍生的湖会、潮会和铅锡交子、金银关子等等名目的纸币。到了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前后，南宋首都临安已有商人发行 便钱会子，因为会子与铜钱换算时会产生一笔不可小觑的利润，绍兴二十九年（1159）时会子的发行权被临安府所持有，三十年转到户部，绍兴三十一年在首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成立了行在会子务，专职管理会子的印制、发行等事项，从此，会子成为南宋政府应对经济窘境的手段之一长期使用。为了抑制铜钱流向北方金国，政府很快在两淮地区推行会子。为了统一会子的规格，还专门设立造楮纸的工场，规定只能以楮纸印制会子，会子因此也叫做 楮币、楮券。

各种会子、交子、关子、公据，都有一定数额的储备金作为发行基金，以保证会子的市场价值。绍兴三十年南宋政府持有会子发行权之后，开始时还能够以足额的储备金来作保证，会子的价值拥有可靠的经济后盾，市场价值稳定。到了孝宗乾道（1165 - 1173）年间，因为国防和向金国进贡等原因，国家财政困难，出现了前一届会子还没有兑换结束，政府在没有增加储备金的情况下，连续印发了下一届会子，同时增大了发行额，会子的市场价值因此疲软。《宋史·食货志下二·钱币》载：乾道四年（1168）议定立界限额发行会子，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缗为额。但是，这个规定很快就因为国家财政的困难而被打破，孝宗淳熙四年（1177）发行第四界时，会子发行额就已开始大幅度增加。如此积弊年复一年，至第九界以后已无法控制数额，宁宗（119-1224）在位期间，因为开禧年间韩侂胄轻率向金开战，军费骤增，会子发行量成倍上升。以下是宁宗开禧元年第十三届至嘉定四年第十五届的三届会子发行量的统计：

开禧元年（1205年）第十三界：发行量5548万缗；

旬之近，一绳以法，由内及外，观听聿新，则铨销之奸知畏矣。香、药、象、犀之类异物之珍奇可悦者，本无适用之实，服御之间昭示俭德，自上化下，风俗丕变，则漏泄之弊少息矣。此端本澄源之道也。有旨从之。

可以看出，陈求鲁对于滥发会子的做法和支持会子的人（急于扶楮者）是深恶痛绝的，以致于在奏折中用了 急于扶楮者，至噉盗贼以窥人之阖奥，峻刑法以发人之窖藏 这样的峻语来陈说。针对由会子引发的国家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陈求鲁的主张是以钱本位的手段来解决。他认为要应对这一场危机，必需处理好钱币的发行量及其在流通领域的不正当现象，为了防止铜钱的外流。应当减少或不购买不必要的进口货物。他的这一见解，得到皇帝的肯定：有旨从之，自淳祐八年（1248）到景定四年（1263）的15年左右的时间里，没有发行新的会子。可是，因为南宋国家经济颓势这时已经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尤其是，这之前联合元军消灭了金国，但元朝却因此成了南宋更强大更危险的敌人，国防形势更为严峻，加上国内水旱灾害的发生，虽然皇帝听从了陈求鲁的建议，但终理宗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措施控制住物与钱俱重 的经济形势，到理宗末年的景定四年（1263），仍然还是以每日增印15万（第十八届）会子这一类似于饮鸩止渴的办法来缓解经济上的困境。

会子自从绍兴三十年被南宋政府掌握之时起，伴随着走完了之后的南宋政府全部历程，它诞生的时候，在活跃市场，增大流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南宋政府肥它当作财政手段、尤其是企图以完全等同于现代经济学理念中的通货膨胀的形式来支撑财政困境时，它就成了套在南宋政府脖子上促使经济持续恶化的绞索，最终导致了南宋经济的全面崩溃。有学者研究表明，南宋被灭亡，经济的崩溃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不过这是别话，不说。

（本文依据陈求鲁纪念馆的资料和《宋史·食货志》，综合网络资料而成。）

（照片来自网络，请作者是与编辑联系，以便奉上稿费）